

论 述

马共第一次党内分裂的主角：邬炽夫

/ 欧阳明智(Marc Opper) (独立学者，美国弗吉尼亚州梅卡尼克斯维尔市)

* 作者注：本文获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at Yale University)和美国哈利·弗兰克·古根汉基金会(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的基金支持，并感谢足印出版社执行编辑卢朝基和原不二夫的热心帮助。

前言

根据马来亚共产党于1946年出版的官方历史文件《南岛之春》，在1932年至1936年间，马共曾经发生过两次党内分裂事件：

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党内起了严重的变化，就是党内反对派的产生，他们组织了马来亚共产党大同盟，公开进行投降敌人，出卖革命的反党行为，但由于各同志坚持着为党奋斗，为革命牺牲的英勇精神，在这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创造精神，终于把反对派们肃清，由此，更加使马来亚共产党走向真正有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去。⁽¹⁾

.....

一九三五年党内的反对派再复出现。他们违背了党的决议，出卖工人群众的利益，号召和拉拢一些青年的共产党员，大举反对马来亚共产党的行为，企图帮助敌人来破坏马来亚共产党，要把马来亚工人劳苦大众，永远的驯服地做英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奴隶，这个时候，是马来亚共产党有史以来最严重变化的时候，而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和各级党部以及全体同志，并不因此而放弃了他们为马来亚民族和人民的最后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任务，反之，更加积极地坚韧地坚持他们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执行马共中央第五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决议，站在保障马来亚工人劳苦大众的利益上，组织和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大规

模的同盟罢工斗争，有力的回答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残酷进攻，严重的打击了反对派反党的行为，结果，便将反对派肃清出去，保护了党，使党的组织基础巩固起来。⁽²⁾

这个“反对派”和“马来亚共产党大同盟”到底是什么？它的成员是哪些人？《南岛之春》没有细述，而且除了这本书之外，马共的其它机关文件完全没有提过“马来亚共产党大同盟”这个组织。但是日本学者原不二夫认为，《南岛之春》所谴责的“马来亚共产党大同盟”似乎是指1928年初成立的“马来亚反帝大同盟”。与此同时，原不二夫也提出，大多数马共党员在回忆录和采访中，对反帝大同盟的评价相当高，所以他怀疑两者是同一个组织。⁽³⁾

无论如何，众所周知的是，1935年党内分裂的主角和1931年至1936年马来亚反帝大同盟的秘书是同一个人：邬炽夫。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定：1935年的党内分裂，实际上是1932年党内分裂的延伸。也就是说，在上世纪30年代，马共发生了第一次严重的党内分裂。

必须指出，1946年是莱特党内权力鼎盛时期，《南岛之春》是莱特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的结晶。除了《南岛之春》之外，没有其他的马共机关文件、学术性历史著作提到1932年的党内分裂。相反的，那些文件、作品都称党内分裂发生于1935年或1936年。造成困惑的症结在于，1932年没有

⁽¹⁾ 《南岛之春》，新加坡，马来亚出版社，1946年，页9。

⁽²⁾ 同(1)。

⁽³⁾ [日]原不二夫著，刘晓民译：《马来亚华侨与中国——马来亚华侨归属意识转变过程的研究》，曼谷，泰国曼谷大通出版社，2006年，页19。

发生实质性的党内分裂，但这“两次”分裂的主角是同一个人：邬炽夫。1932年是邬炽夫第一次反对马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总而言之，马共第一次党内分裂于1932年开始，于1936年结束。**

本文引用大量的原始和二手资料，描述邬炽夫的生平和马共第一次党内分裂。本文首三个部分描述邬炽夫的青少年时期和他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第四部分描述他在马来亚的活动。第五部分是结论。

青少年时期参加农民运动

邬炽夫，原名邬成才（又名邬志豪），广东大埔客家人。⁽⁴⁾ 1925年初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随着第二次东征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到达大埔地区，当地的党员人数激增，于是成立了中共大埔特别支部。⁽⁵⁾ 中共大埔特别支部书记赖释然，曾经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随着大埔地区中共影响力的扩大，赖释然亟力吸收党员领导和扩大农民运动。⁽⁶⁾ 这时，邬炽夫的积极表现和工作能力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

1926年7月，中共大埔青年团书记兼中共大埔特别支部委员谢卓元选派邬炽夫等十几个大埔党团员参加中共农民运动先驱彭湃和罗明在汕头新成立的东江农民运动讲习所。⁽⁷⁾ 东江农讲所是彭湃和中共在广东各地设立的农讲所之一。除了最著名的广州农讲所之外，还有海丰和普宁的农讲

所。笔者虽然无法确定邬炽夫的出生年份，但是估计他大概是在1901年和1908年之间出生，因为参加农讲所的最低年龄是18岁，而加入共青团的最大年龄是25岁。⁽⁸⁾

邬炽夫及其他青年党员和左翼知识分子，都是当时崭新革命方式—即农民能不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者。⁽⁹⁾ 现在人们普遍认同农民是中共革命的核心，但在当时这却是一种前途未卜的革命方式。马克思所想象的和布尔什维克党所实行的是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中心的革命。此时，中共也还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政党，它认为农民是愚昧无知、一盘散沙的无产阶级同盟者。

农讲所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成立的。当时，国共两党都认为农民有可能是统一中国的重要力量之一。到了1926年，彭湃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已经扩展到广东的十几个县，各地农会会员人数达到十几万。

1926年夏参加东江农工运动养成所

东江农工运动养成所于1926年7月18日开学，大约有二百名学生。⁽¹⁰⁾ 国民党左派人士林修雍任所长，罗明任教育处长。关于邬炽夫在养成所的唯一具体细节是他与罗明的关系相当密切。⁽¹¹⁾ 养成所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分组讨论和阅读材料。课程的内容包括：三民主义、组织工农、帝国主义、社会发展史、国共合作、宣传工作等。还有彭

⁽⁴⁾ 罗明：《罗明回忆录》，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32－36；罗明：〈我在大埔活动的一些情况〉，载于中共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大埔党史》总第21期，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2008年，页115－18。

⁽⁵⁾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页26；陈介成：《大埔客家人物》，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20；（日）原不二夫著，刘晓民译：《马来亚华侨与中国——马来亚华侨归属意识转变过程的研究》，曼谷，泰国曼谷大通出版社，2006年，页42。

⁽⁶⁾ 卓加里：〈赖释然〉，载于《大埔党史人物》，中共大埔县委党史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第1辑，大埔，大埔县印刷厂，1990年，页49－53。

⁽⁷⁾ 中共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大埔县地方史》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页13；卓加里：〈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党在大埔九十年〉，载于中共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大埔党史》总第24期，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2001年，页74；中共饶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饶和埔诏苏区史料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430－31。

⁽⁸⁾ 〈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载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讲习所文献资料》，广州，出版社不详，1983年，页22；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胡献忠编：《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页84。

⁽⁹⁾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最好的英文著作是：（美）Roy Hofheinz，《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被冲散的农潮：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和（意）Fernando Galbiati，《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彭湃和海陆丰苏维埃）（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中文的历史资料和通史有广东省档案馆、中共普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普宁革命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共普宁市委研究室、普宁市教育局、普宁市广播电视台编：《普宁革命故事》，普宁，普宁怡昌印刷厂，2001年。

⁽¹⁰⁾ 罗明：《罗明回忆录》，页32－36；罗明：〈我在大埔活动的一些情况〉，页115－18。

⁽¹¹⁾ 郭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前后的追忆〉，载于梅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大埔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大埔县党史研究室编：《如火岁月》，梅州，梅州日报社，2009年，页46－47。关于林修雍生命的资料，参阅南砂乡志编纂领导组编：《南砂乡志》，出版地不详，南砂乡志编纂领导组，2002年。

湃及其重要助手林苏主讲的一门课，分析讨论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¹²⁾。除了上课学习之外，学生也要参加黄埔军校毕业生所领导的军事训练。因为汕头市的中学择定9月1日开学，农讲所只好把学习时间缩短为一个月，于8月18日结业，把学员派到各地去组织农民。

1926年至1927年参加普宁革命

邬炽夫被派到广东省南部的普宁县，于1926年10月之前到达那里。当时，彭湃所成立的农会和中共支部，已经在普宁活动了好几年。普宁是农民运动的重要地区，农会会员人数接近15,000户。⁽¹³⁾ 在国共合作反对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运动中，普宁农会领导45,000多农民于9月19日集中于葫芦地村（距离普宁县城15公里左右），要求贪污县长熊渠下台。大会由中共普宁支部书记、普宁农会主任陈魁亚主持。揭露熊渠罪状以后，大会选出代表赴汕，控告熊渠罪行。广东省监察院作出对熊渠的撤职裁决，但熊渠早已闻讯，弃职潜逃。⁽¹⁴⁾ 中共官方的普宁历史是这样总结这个事件：

普宁县工农群众驱熊斗争的胜利，标志着普宁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和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¹⁵⁾

约一个月后，即10月22日，普宁农会在培风塔（位于乌犁，离普宁县城20公里左右）塔脚召开代表会议。⁽¹⁶⁾ 会议通过“二五减租”和扩大农民自卫军的决议。⁽¹⁷⁾

这个决议标志着普宁农民运动进入新阶段，因为农会不再是恳求，而是要用武力强制改变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邬炽夫负责创办普宁县农会的机关报《普宁周报》，于10月22日代表会议开

会同日出版。该报刊登“二五减租”和农会的重要决议和宣言以及普宁地区农民运动的消息。共青团员携带《普宁周报》，组织了200多人参加12个宣传队，深入各地农村，运用口头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形式进行宣传，动员群众参加减租斗争。该报每逢周六出版，但持续时日不长，只出版了三个星期，便于11月6日停刊了。邬炽夫有没有参加这些宣传队不清楚，但他身为共青团员和养成所的毕业生，他很可能参加了。

在中共领导下，普宁农会实行“二五减租”和废除苛捐杂税。减租斗争胜利后，各地农民踊跃参加农会，加入中共的党员人数也激增。在1926年1月，普宁全县只有20多名党员和一个支部（即中共普宁支部）。但到了同年11月，全县党员就发展至350人，建立了25个党支部，原中共普宁支部改称中共普宁县委员会。同年12月31日，农会截获当地一名姓方的地主从汕头运来的大炮和子弹，进一步加剧了日益强大和越来越激进的农民运动与地主、地方掌权者之间的紧张关系。⁽¹⁸⁾



罗明（1940年摄于新加坡）

当国共统一战线在“四一二事变”（指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叛变革命，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的事件）后彻底崩溃时，普宁的地方上层份子把该事件视作发动对农民协会和中国共产党进攻的信号。4月15日，普宁国民党右派和农村地主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和农民积极份子。为反击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地主的进攻，中共普宁县委立即将农会武装起来，在普宁县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政

⁽¹²⁾ 罗明：〈风雷激荡闽粤间——回忆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下）〉载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99－101。关于林苏生命的资料，参阅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惠阳地区中共党史学会编：《东江英烈传》第2辑（出版地不详，出版地不详，1984年），页128－33。

⁽¹³⁾ 中共普宁市委研究室编：《中共普宁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页29。

⁽¹⁴⁾ 中共普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普宁市历史大事记：1919－1999》（普宁：广东省普宁流沙怡昌印刷厂，1999年），页7－8。

⁽¹⁵⁾ 《中共普宁党史》，页33。

⁽¹⁶⁾ 培风塔取名自《庄子》内篇《逍遥游》中“培风”一语。“培风”的意思是“凭风”。原文是：“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¹⁷⁾ 《中共普宁市历史大事记》，页7。

⁽¹⁸⁾ 中共普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普宁市历史大事记：1919－1999》，页7－8。

权，并在4月23日发动武装暴动。⁽¹⁹⁾

普宁暴动失败后南逃马来亚

中共普宁县委集合了4,000多名农民军围攻普宁县城，城内有县长戴恕和从乡村逃进县城避难的地主豪绅。⁽²⁰⁾ 戴恕和地主武装无法打破包围，便派了两个人黑夜出城，赶赴汕头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求援。在普宁县农村地区，没有逃走的地主则组织民团，向培风塔塔脚的普宁农军指挥部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地主武装被击败，农会胜利了。⁽²¹⁾

4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从汕头出发，沿途烧杀掳掠，引起农民极度恐慌和愤怒。中共普宁县委召集农民起来反击，领导上万农民攻击国民党军队，鏖战两个多小时后，终于把117人的国民党军队完全歼灭，这次胜利，农军不仅卤获大量武器，也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农民的斗争精神。他们立即返回村庄庆祝胜利。

翌日，即4月27日，另一支200多名持有现代武器的国民党士兵来犯。农军还没有作好周密部署，力量分散，无法击退敌军和阻止他们进入县城，增援城内的地主武装。尽管如此，农军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完全控制着县城以外的农村地区。因此，国民党军不愿出城，进入乡村地区，因而县城仍处于包围之中。

这个脆弱的僵持局势持续到5月5日，当天城内国民党军出城，包围设在培风塔的农会农军指挥部（邬炽夫当时可能在那里）。经过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后，农会和农军主动撤退培风塔，至少有31名来不及撤退的农会会员和农军遭到捕杀，各地支持革命的乡村惨遭蹂躏。⁽²²⁾

农军撤退后，国民党军清除普宁县城周围剩下的中共部队，终于打破农军对县城为期两个星期的包围。培风塔失陷及农军撤退标志着普宁中共武装革命失败的开端。强大的农军已经陷入被动，在国民党的摧残下，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

即将瓦解。13日，从汕头调遣过来的大批国民党增援士兵到达，完全击溃农军剩下的部队，迫使他们撤退到中共控制下的陆丰。

虽然中共普宁县委所领导的武装暴动不足一个月之久，但它对普宁的影响极为深刻。基于邬炽夫后来的革命生涯，普宁的革命对他的影响显然也非常深刻。首先，普宁因这场起义而遭受严重的破坏。普宁县各地，尤其是县城周围“尽成焦土”。⁽²³⁾ 根据广东省赈务委员会的报告，受影响的村庄共有三百多个、数以万计的房子遭焚毁，成千上万的难民流离失所。⁽²⁴⁾ 虽然双方对受害人数没有可靠的估计，但国民政府的一项报告估计中共及其领导的组织屠杀了1,600多人。⁽²⁵⁾ 而据中共官方编写的普宁党史，仅普宁八乡，被烧房屋达6,000多间，遭杀戮的农民3,000多人。⁽²⁶⁾

邬炽夫逃出普宁的具体日期不明，但根据所有关于邬炽夫的资料，他是在“四一二事变”后逃走的。作为一名积极分子和养成所毕业生，他可能会一直逗留在普宁，直至农民运动完全失败后，大约在1927年5月中到5月底才南逃马来亚。暴力和牺牲是革命的两个基本方面。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然而，邬炽夫在1927年逃离中国时，他一定会对这场革命的失败进行反思：他和同志们所努力建立起来的农民权力，为何会在顷刻之间就被砸碎了呢。

邬炽夫在马来亚，1927—1936年

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邬炽夫，于1927年中到达马来亚。华南大革命的失败重创了中共。有的党员对革命失去信心：有的脱离革命，或叛变投敌和协助国民党肃清中共的残余势力。有的党员则变成激进分子，要继续领导革命。最后，像邬炽夫那样的一批人，则坚持革命，但觉得只有改变政治路线，革命才能成功。正是这个从华南中共革命失败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导致马来亚共产党第一次党内分裂和后来邬炽夫的被谋杀。

⁽¹⁹⁾ 中共普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普宁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页50－51。

⁽²⁰⁾ 中共普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普宁市历史大事记：1919—1999》，页9－10；《中共普宁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页51－54。

⁽²¹⁾ 王松斌：〈暴动烈火〉，载于《普宁革命故事》，页18－19。

⁽²²⁾ 王松斌：〈暴动烈火〉，页21。

⁽²³⁾ 〈共产军窜扰潮汕时之教会〉，载于《通文报》第1270期，1927年11月，页6。

⁽²⁴⁾ 《广东民政公报》，第44卷，1929年，页160－61。

⁽²⁵⁾ 《广东省政府公报》第73－74期，1929年，页88－90。

⁽²⁶⁾ 中共普宁市委研究室编：《中共普宁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页56。

像许多南渡的中共党员一样，邬炽夫联系到马来亚当地的共产党员，加入南洋共产党，后来转入马来亚共产党。邬炽夫从1927年到1930年的活动情形，缺乏史料的记载，但到了1931年，他被选为马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同时也是南洋反帝大同盟秘书长，后来转任马来亚反帝大同盟秘书长。⁽²⁷⁾

作为反帝大同盟的秘书，邬炽夫亟力吸收人员，扩大革命队伍。其中之一是1932年从中国逃到马来亚的左翼文学家马宁。大约是在1932年中后期，有人介绍邬炽夫给马宁认识。马宁形容他“瘦削的身材，不怎么灵敏，说话时显得很吃力似的”。邬炽夫提醒马宁“要持重些，行动要秘密些。”他告诉马宁说，他是马来亚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总部的一个成员，他是奉着总部的指示来跟马宁谈话的。请马宁参加反帝大同盟做宣传工作。他希望马宁参加他们的工作。⁽²⁸⁾他告诉马宁说：

马来亚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是由马来亚各民族精明的分子所组成的。建立大同盟的目的是争取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自由，中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民族自决。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做艰苦的工作，要有更多的干部，要做更广泛、更深入的发动。⁽²⁹⁾

马宁犹豫不决，担心他没有资格做这样的工作。邬炽夫回应，反帝大同盟缺少能编报纸和写宣传品的干部，马宁可以边做边学：

……这是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你只要亲身参加到我们中间来，你一切就会知道。马来亚的各民族并不是生成的被征服者，而是喜欢自由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祖国的民族解放潮流给马来亚华侨的影响是极深刻的。⁽³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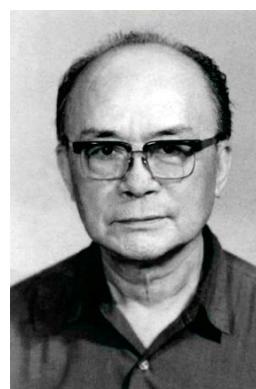
邬炽夫最终说服了马宁。后来，他们一起同住。我们因此得知某些关于邬炽夫私人生活的细

节。邬炽夫到了马来亚以后，曾做过教员和商店店员。他热爱知识，有极强的读书欲。马宁形容邬炽夫有一个“几乎被压断了架子”的书架，上面“满满地全是社会科学书”，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和几位重要哲学著作的翻译书，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等。当马宁把书拿下来翻看时，他发现邬炽夫在书里写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和批注。邬炽夫虽然好像是“一位做粗出身”的人，但他的“读书精神”让马宁感到吃惊。⁽³¹⁾

在1935年左右，马共党内开始发生分裂。虽然“反对派”的具体成员不明，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邬炽夫领导的反帝大同盟的成员，其中一人是在1935年担任反帝大同盟秘书长的陈子彬。邬炽夫、陈子彬等人认为，马来亚的工农群众太落后了，不可能动员他们起来推翻英帝政权。他们认为，马共应该以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的模式招募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成员，到群众中去，帮助群众提高阶级意识。邬炽夫的这种主张是与马共采用的革命方法相冲突的，但却和他自己在中国的经验相似，他是在东江农讲所受过训练的一名知识分子，曾经到过农村去发动农民。马共领导层认为这是一种异端邪说，因为马共应该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运动。因此邬炽夫的革命思想遭到马共中委会的严厉批评和否定。⁽³²⁾



马宁 (1930)



陈子彬

⁽²⁷⁾ 原不二夫撰、刘晓民译：《马来亚华侨与中国—马来亚华侨归属意识转换过程的研究》，泰国曼谷大通出版社，2006年6月版，页42。原不二夫关于邬炽夫的资料来自张明今给原不二夫的信函。杨进发提供关于邬炽夫的细节不多，只说邬炽夫于1935年（而不是1931年）被选为马共中央委员会，见杨进发著：《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年，页166。

⁽²⁸⁾ 卓如编：《马宁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年，页387–89；原不二夫，〈マラヤ共产党元干部会见记〉（马来亚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见记），载于《アジア経済》（亚洲经济季刊）第33期，第7号，1992年，页88–90。

⁽²⁹⁾ 同上书，《马宁选集》，页387。

⁽³⁰⁾ 《马宁选集》，页388。.

⁽³¹⁾ 《马宁选集》，页389。

⁽³²⁾ 原不二夫：《马来亚华侨与中国—马来亚华侨归属意识转换过程的研究》，页19, 22–23。Belogurova还强调了精英主义在阻碍党吸引马来亚的非精英阶层能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见[俄]Anna Belogurova(白安娜)著：“A Durian for Sun Yatsen:

马共在1946年出版的一份党史文件这样概述“反对派”：

他们违背了党的决议，出卖了工人群众的利益，号召和拉拢一些青年的共产党员，大举反对马来亚共产党的行为，企图帮助敌人来破坏马来亚共产党，要把马来亚工人劳苦大众，永远的驯服地做英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奴隶。⁽³³⁾

伍天旺在1947年的英联邦共产党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也有更多关于“反对派”的细节叙述：

但不幸的是，我们党的队伍内部的一小部分人却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恐怖政策……他们大胆地和无耻地要求终止罢工并把激进工人分成小型的地下组织。他们强烈反对在半公开的基础上组织劳工群众。他们主张秘密地对激进工人进行教育和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努力。他们谴责党的反帝统一战线政策，把它标签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路线。此外，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公开地反对党，在党内组织分裂集团，并且毫不掩饰他们对中央委员会采取的对抗态度。……他们实际上是反动派在党内的邪恶代理人。……在六个月内，机会主义者的真正面目就完全被暴露了。⁽³⁴⁾

谢文庆把“反对派”的主张概括为“偃旗息鼓，转入地下，避免冲突，停止在与警察的战斗中

牺牲人力，保存力量”。⁽³⁵⁾ 正如谢文庆正确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是左倾机会主义，而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如同中共某些时期所声称的“取消主义”。⁽³⁶⁾

马共党内这个比较温和的反对派与中委会的分歧超越了革命的正确战略与策略的范围。邬炽夫担任马共的几个重要职务，包括从1935年9月起担任中委会委员。⁽³⁷⁾ 他不仅怀疑马共政治路线正确性，而且对海南干部控制马共的情况表示不满。1935年末，他对马宁说，“马共中央被海南人掌握，都成为海共了。他们的水平很低。我们另立中央吧”。⁽³⁸⁾ 邬炽夫也邀请时任中央书记的刘登乘和反帝大同盟成员陈子彬和马宁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³⁹⁾ 不久后，马共中委会的海南干部识穿了邬炽夫的这次阴谋。⁽⁴⁰⁾

邬炽夫在1935年末开始活动，但被更激进的中央委员们所揭发。与此同时，1935年12月和1936年3月两名中委会成员梁昆华和“Tan Tek Seng”相继被捕，更引起党内恐慌，怀疑有内奸出卖。⁽⁴¹⁾ 除了梁昆华和“Tan Tek Seng”外，还有两名被捕的马共党员叫陈亚生和林德章。1935年12月15日，新加坡政治部在法庭上控告林德章、陈亚生、梁坤华三人持有非法文件，但因为政治部无法提供确凿证据，最后不得不放弃该案。⁽⁴²⁾

⁽³³⁾ Interwar Communism in British Malaya (1926–1942)》(孙逸仙的榴莲：两次大战期间英属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运动，1926–1942)，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12年，页136–46。

⁽³⁴⁾ 《南岛之春》，新加坡，马来亚出版社，1946年，页9–10。

⁽³⁵⁾ 伍天旺著，钟华译：〈马来亚共产党〉，载于《拂去灰尘的记忆》，足印丛书编委会编，香港，足印出版社，2014年，页228。

⁽³⁶⁾ 谢文庆：《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1924–1941: 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Selected Documents and Discussion》(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到共产国际，1921年至1941年：马来亚共产党的学徒时期：马共文件选编和分析))，Ithaca: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2年，页22。

⁽³⁷⁾ 谢文庆：《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1924–1941: 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Selected Documents and Discussion》(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到共产国际，1921年至1941年：马来亚共产党的学徒时期：马共文件选编和分析))，页22。关于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参阅Hsiao Tso-liang(萧作梁)著：《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34 (1930–34年中共党内权力消长史))》，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1年。

⁽³⁸⁾ 上引杨进发书，页166。

⁽³⁹⁾ 这句话引自张明今给原不二夫的信函。见原不二夫著：《马来亚华侨与中国—马来亚华侨归属意识转变过程的研究》，页23。

⁽⁴⁰⁾ C.F. Yong (杨进发)：《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p166.

⁽⁴¹⁾ 引自1993年原不二夫在广州与陈子彬所作的访谈。

⁽⁴²⁾ 这两名被捕的人是梁昆华 (Leong Kun Hoa, 1935年12月12日被捕) 和 “Tan Tek Seng” (陈德生？或鍾德勝？1936年3月11日被捕)。谢文庆：《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页86；Ban Kah Choon(万家俊)和Yap Hong Kuan(叶鸿源)合著：《Rehearsal for War: The Underground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大战的前奏：抗日的地下斗争))，Singapore, Horizon Books, 2002年，页82；原不二夫：《马来亚华侨与中国》，页22。。

⁽⁴³⁾ 〈林德章、陈亚生、梁昆华昨被控为非法分子，案展期每人责保二百元〉，载《南洋商报》，1935年12月15日；〈三华人被拘控为犯非法份子案案尚须调查展期续究〉，载《南洋商报》，1935年12月22日；〈闽潮琼三少年被控为非法份子昨官谕将三被告释放〉，载《南洋商报》，1935年12月29日。这次不是梁昆华第一次和警察有摩擦。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档案，温家安，梁昆华于1932年在支援十九军对日军侵略上海的机关，上海各界慰劳十九路军临时办事处（还是在其前身组织十九路军办事处）被捕，同年5月被释放，后来南渡马来亚。1935年12月宣告无罪以后，他被驱逐出境，1936

莱特大概在1935年下半年开始联系马共的领导层。马共自从成立以来，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一直都是不稳定的，到了1935年，双方的联系甚至陷于完全中断的状态。在这个情况下，马共中央无法确定莱特是否真正的共产国际代表。⁽⁴³⁾我们不清楚莱特到底怎样联系上马共领导，但毫无疑问，莱特在表面上确是一个资深的革命家，使得在中国或马来亚拥有丰富革命经验的马共领导层接受了他的指导。

1936年4、5月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莱特，向马共的海南人领导干部建议肃清以邬炽夫为首的反对派。实际上，莱特自己的政治思想是接近于邬炽夫和他的支持者。但是，莱特却认为邬炽夫派系的观点和活动是严重违反党纪的。可能考虑到在未来他要将马共的政治路线由左转到右，莱特于是宣布邬炽夫及其追随者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⁴⁴⁾ 在1936年，被称为托洛茨基派的人，至少要开除党籍，也有可能遭到处决。莱特知道苏联肃反托派的情形，也熟悉

被称为托派的人的严重后果，即使指摘是毫无根据的。

1936年5月，中委会决定要邬炽夫深入工农群众，派他到马六甲某地去亲身领导那里的工人罢工。他坐火车到达森美兰州淡边市，从那里骑自行车往马六甲。在淡边市郊区，潜伏在路边的海南籍马共党员（有可能是后来的中委会成员阿仲）用铁锹打死他，⁽⁴⁵⁾ 年仅30岁左右。

结论

邬炽夫及其他反对派成员在1936年被肃反时，正是莱特崛起的关键时刻。当时，这场肃清反对派的斗争被认为是成功的，马共中央的权力完全恢复了。邬炽夫的人生经历，与许多逃亡到马来亚继续在南洋干革命的中共党员的生活经历如出一辙。在中国，他所参加的农民运动，奠定了毛泽东后来领导的革命理论的基础。在马来亚，他

年10月居住厦门，后来下落不明。见〈D-7085: Copies of Letters Obtained by Singapore Authorities Dealing with Endeavours Made by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to Establish Lia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新加坡当局拦截的马共企图联系中共信件）(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84)，胶卷27,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1894-1949》(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文件)。陈亚生好像留在马来亚，他的名字在1939年第三批回国抗日机工名单录上，参加维持滇缅公路通车的斗争。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年), 页307。「Tan Tek Seng」和林德章的下落不明。郭仁德认为, 梁氏和Tan氏（郭把Tan称为“钟德盛”）因为不同意莱特当时的统一战线，被莱特出卖。郭仁德:《神秘莱特》，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页25 - 27。应该指出的是，1935年马共还没有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所以郭仁德描述的情形值得商榷。

⁽⁴³⁾ 马共成立的一年后，马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被中断，到1934年有断断续续的联系，后来又中断了，到1939年才恢复了。两名分析共产国际档案的学者，都发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没有收藏任何共产国际和马共1935年和1938年间交流的文件。她还发现共产国际东方局在1935年7月提交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半”中没有与MCP建立任何联系。见(俄)Anna Belogurova (白安娜)著:《A Durian for Sun Yatsen: Interwar Communism in British Malaya (1926-1942)》(孙逸仙的榴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属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运动, 1926-1942),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2年, 页231、233、246; 原不二夫著:《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as Recorded in the Comintern Files (共产国际档案关于马来亚共产党的记录)》,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16。新加坡政治部1934年、1935年和1936年的年度报告证实了白安娜和原不二夫的结论。见谢文庆著:《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1924-1941: 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Selected Documents and Discussion》, 页70、77、84。

⁽⁴⁴⁾ 郭仁德说，莱特把反对派称为左倾机会主义者，见郭仁德著:《神秘莱特》，页21。而张明今则说，莱特把反对派称为托洛茨基派，见原不二夫著:〈マラヤ共产党元干部会见记〉, 载于《アジア経済》33, no. 7 (1992): 页95。有意思的是，莱特潜逃很久之后，马共仍然保持莱特对反对派的标纤，把他们称为托洛茨基派。在1960年代初，少数从30年代遗留下来的中委会成员之一阿仲，在给马泰边区的马共党校撰写的一份马共史稿中，仍然把反对派称为托洛茨基派，见阿仲撰:《党史资料补充》，载于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编的《战前地下斗争时期——资料增补》，吉隆坡，2012年，页56 - 58。如上所述，反对派实际上是右派，而不是左派。他们的想法接近于斯大林主张的国际革命思想，即无产阶级应该跟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合作，而没有接近托洛茨基的思想，即主张建立独立的以无产阶级为主的政党和革命运动。

⁽⁴⁵⁾ 邬炽夫被肃反的经过，参阅晴朗(黄秀夫),《伪装必须剥去！一彻底揭露陈平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澳门: 出版社不详, 1987年), 页4; 谢文庆,《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页86 - 87; 原不二夫,《马来亚华侨与中国》, 页23 - 24。郭仁德的叙述和晴朗、谢文庆和原不二夫的大同小异，只是郭仁德说根据目击者描述凶手的相貌身材，有人怀疑凶手是阿仲，见郭仁德著,《神秘莱特》，页38。阿仲确实是海南人，见杨进发著《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页186。原不二夫和郭仁德都说邬炽夫被杀地点在淡边附近。他们两个好像都确定这个事实。郭仁德出版于1999年。他没有引用原不二夫的任何著作、文章，但他也没有明确提供关于邬炽夫资料的来源。原不二夫的著作，中译本出版于2006年(日文原本于2001年)。关于邬炽夫被杀的地点，原不二夫引用他与马宁、张明今的采访(采访的日文记录出版于1992年)。张明今说，1938年他在森美兰工作的时候，有个老党员告诉他邬炽夫尸体埋藏的地点。在采访中，马宁说邬炽夫是被活埋的，见原不二夫撰:〈マラヤ共产党元干部会见记〉, 页90。晴朗没有显示他的资料来源，是唯一称邬炽夫被杀后，“弃尸道旁”，见晴朗著:《伪装必须剥去！一彻底揭露陈平一伙的反革命罪行》，页4。

领导了反帝大同盟，是一位正在成长中的革命理论家。他如果继续活下去的话，有可能会给马来亚共产党创建更完整的革命理论。从当时马共的政治路线上看，邬炽夫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但是，他是个热血革命家，努力把马列主义“马来亚化”，试图创建出适合马来亚具体环境的革命理论，但是他未能成功。